

《小团圆》与张爱玲

■ 谢佳贝

张爱玲，她一身绸缎旗袍，斜侧着，一个奇女子。她的奇，不光在于她身世的坎坷迷离，不光在于她作品中的悲戚爱情，更在于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一种女性深思的影响。

尽管张爱玲已经过世了十多年了，但她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而她那敏感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也在她的作品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也许是因为张爱玲在人生起点上恰恰没能有效的建立起对外界的基本的信赖感，才使她在作品中不禁表现出一种感情上的“缺失”，她笔下的女性大多在“旧”的社会中展示出“新”的生活姿态，而这种“新”，则又深藏于那种“旧”的深层意识中，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寻找婚姻，寻找依靠，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半生缘》中的姐姐曼璐等都是张爱玲笔下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成功的塑造了那么多有特点的女性形象，而最具争议的则是在最近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小团圆》中。

《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小团圆》初稿写成之后，张爱玲曾幸福地告诉挚友：“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但随着张爱玲本人身体不佳，其写作进度非常缓慢。自1970年代开始创作《小团圆》，20年间已几易其稿，但在遗嘱中却要求将手稿“销毁”。张爱玲过世之后，张爱玲的遗物寄到了宋淇家中，遗物中，尚未完稿的《小团圆》有好几个版本；虽然张遗嘱中注明“销毁”，但张爱玲的好友平鑫涛和宋淇却同样“舍不得”。宋淇之子宋以朗此前曾透露，1967年，张爱玲寄《小团圆》初稿来，当时宋淇写了六页纸的复信，认为这作品不能公开，其中一点理由就是读者看了，不会注意其文学价值，只会认为作者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引起非议。

的确，作为一个了解并且喜爱张爱玲的读者来说，对于《小团圆》中的每个角色都感觉熟悉与相似，难道真的如我们所想，邵之雍是胡兰成、比比是炎樱、蕊秋是张爱玲的母亲、九林是张爱玲的弟弟、文姬是苏青、荷华是柯灵等等，可这真的是一本完全的自传体小说么？这个我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章《小团圆》要不要当做一本自传来研读

陈子善说：“小说是虚构的，这是前提，对号入座是很危险的。”虽然这句话很有道理，但也无法制止我们把《小团圆》向自传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把它作为一部作品来读，一部带有张爱玲自传色彩的作品，不要把人一对号入座，我们可以利用对张爱玲个人的了解，去更透彻的理解《小团圆》中的人物性格关系以及突出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写作的大背景

《小团圆》的前半部分基本上在叙述整个环境的大背景，在二战的影响下，九莉在香港读书，她这样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基本的安全感、幸福感的人没能与外界建立起基本的信赖感，她那现实的成长环境让她对自己的好朋友比比也用金

钱的视角去打量。对于恩人安竹斯先生的死讯，九莉“震撼抽搐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这些都表现了九莉不可能把温情置于比金钱更重要的位置。而对于九莉的父亲，在这个转型的时刻，却成了一个废物，抽大烟、嫖妓、找姨太太，堕落生活，让人记忆犹新。九莉的母亲蕊秋，作为一个受“五四”精神熏陶的新女性，思想前卫，她让九莉念书，其实是一种“投资”，而九莉对自己的母亲虽然比起父亲亲近一些，可九莉的经历决定了她与身边的亲人没有任何真实的感情，《小团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蕊秋正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的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那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行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刹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身体接触产生剧烈的排斥反映，说明母女两人之间明显的隔阂。

第二节 一往情深“邵莉之恋”

“邵莉之恋”似乎更加明显的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张胡之恋”，《小团圆》中写道邵之雍的时候已经一本过半了，“有人在杂志上写了篇批评，说我好。是个汪政府的官。昨天编辑又来了封信，说他关进监牢了”，他们热恋的时候也有详细的描写“他抚摸着这块腿。‘这样好的人，可以让我这样亲近’。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他们一次次的亲吻、缠绵过程的描写，可见九莉的感情投入之深。

《小团圆》中种种描写都可以明显的把现实中和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这种对号入座可以体会张爱玲的前半生的生活状态、心理意识，的确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当我们把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研读的时候也未尝没有意义，当我们把二者结合，找到那个临界点，用文学作品的心态去了解这部作品，又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来细细回味，这不是所有小说想要追求的一个境界，未尝不是一种美。

第二章《小团圆》的创作价值是否存在

路文彬在《残酷冷漠背后的历史感匮乏——评张爱玲<小团圆>》中曾说“《小团圆》再一次向我们证实，遣词造句似乎是张爱玲写作的唯一特长，其所有力气几乎都一如既往地耗费在了如何表达那个人乐于咂摸的半明半暗感觉上。然而，也正是由于此种用心，注定了张爱玲在鸿篇巨制上的无所建树。如果说《秧歌》、《赤地之恋》所暴露出的是历史容量层面的干瘪，那么《半生缘》和《小团圆》昭示的则是思想分量上的严重先天不足。”路文彬认为张爱玲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生活立场，时代命运难以成为她写作的主要内容，这难免要与她的成

长经历联系起来。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世家，然而这样的家庭背景与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快乐的童年。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对子女缺少责任心；而母亲婚后不久便因感情问题在张爱玲很小时离开丈夫、儿女，同爱玲的姑姑一起去法国学美术。她从小就是在这种缺少父疼母爱的环境中长大，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养成了独立的性格。而她的母亲是个很有艺术修养的旧式新女性，为避开不幸婚姻带来的烦恼，她选择了出国。在爱玲眼里，母亲的独立与我行我素的行为，似乎比作为母亲更能够让她接受，尤其是母亲争取个人权利的所为，对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个特殊的时代对她的性格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后，女性人格的重塑、女子就业、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都曾是热烈讨论的话题。张爱玲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经常参加一些座谈和讨论，在这些言谈中也时常反映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如当时比较著名的《杂志》记者邀请张爱玲和与张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做了一次对谈，主题是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张爱玲说：“女子应当到社会上去，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她还说：比起那些深居简出、不谙世事的太太们来说，还是在外面跑跑的职业女性要可爱一点，就是太吃了，又要管家，又要做事，又要打扮。”这些特殊的成长经历，这个特殊的时代，是张爱玲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生活立场，并且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渴望，使她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关注女性意识的优化上，以至于作品多数是描写女性生活、婚姻、与生活抗争的方面，《小团圆》更类似一种漫不经心的回忆，既然这样，为何要要求她一

个女性主义作家一定要站在历史的尖峰，怀揣着民族忧患意识去为历史呐喊为民族哭泣，文学不是万能，在《小团圆》里，只是讲了一个叫九莉的女子的故事，为何要在历史感上对其要求千万。

《小团圆》出版后大家褒贬不一，这是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必经，关于张爱玲，我们了解的已经够多了，而《小团圆》则是张爱玲为自己的写作、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精彩的一笔，当很多年后，我们再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一个经历沧桑，可活的并不寡淡的作家，因为她已经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人生备案，就是它——《小团圆》。

参考文献：

- [1]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 [2]据宋以朗先生在《小团圆》北京首发式上的演讲.
- [3]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

(作者简介：谢佳贝（1988-），女，汉族，四川人，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上接第 53 页) 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富豪范柳原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外有朴素的。从腐旧的家族中走出来的流苏是冰清玉洁且又具有挑逗性的，冰清玉洁是之于外人，富有挑逗性是之于情人。《倾城之恋》所叙述的故事也是不彻底的故事。“贫穷和压力使白流苏对范柳原用尽心机，以期获得一纸证书，为了谋生而谋爱；过分的奢华富贵也使范柳原想通过‘真正的中国女人’来确定自己暧昧的‘中国人’身份，为了谋欢而谋爱”费尽心思算计的爱情是带有讽刺性的，然而尽管带有讽刺性，但是还有一点情的味道。从相敬如宾到相濡以沫，从“上等调情”到“一纸婚约”，经历了大都市的倾覆，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他们都在贪点儿依赖，贪一点儿爱，最后也就真的恋爱了。

若说《花凋》里的亲情是让人黯然酸楚的，《心经》里的爱

情是畸形的爱情，《金锁记》涵盖着旧社会的心酸，《倾城之恋》在表现“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的同时，因着大团圆的结局，在乱世中贪得了一点依恋，一点爱，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动听且近人情的故事。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张爱玲的意象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李 婕（1989-），女，汉族，湖南人，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